

华龄阁名家书系

屈賦新探
(修訂版)

汤炳正

[illegible]

華齡出版社

華語論文發表

屈賦新探

（增訂本）

屈賦新探

屈赋新探（修订版）

汤炳正 著

汤序波 编

华龄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 辉 贾理智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屈赋新探/汤炳正著. —修订本. —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 7

ISBN 978 - 7 - 80178 - 755 - 2

I. ①屈… II. ①汤… III. ①楚辞—文学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9149 号

书 名：屈赋新探（修订版）

作 者：汤炳正 著
汤序波 编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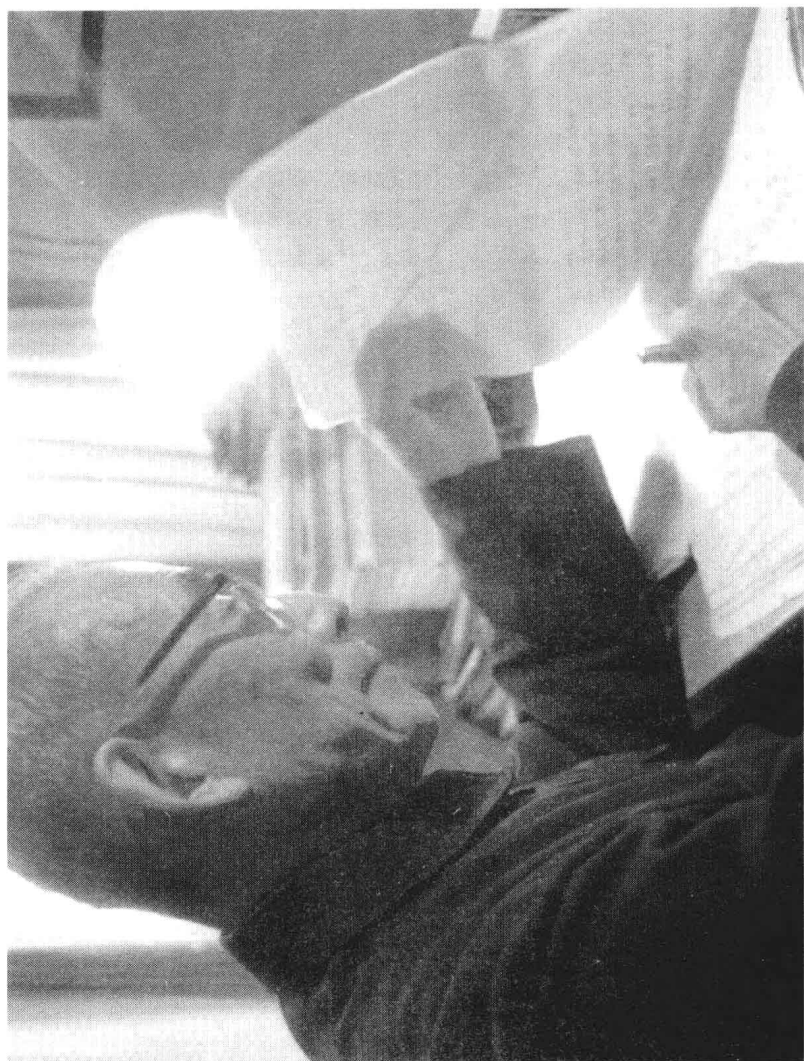
版 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6.75

字 数：235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35.00 元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真：84039173



汤炳正先生伏案修改书稿

如果说《世说》的“重观”，乃民歌集体创作创作结果，那么
赋的“重观”，乃个体诗人从民歌习惯中继承下来的古老
形式。

又小山词《临江仙》有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千古
传诵，实则乃 若溪渔隐曰：东坡九日诗云：“相逢不用忙归去，明
日黄花蝶也愁。”又词云：“万事到头终是梦，休休，明
日黄花蝶也愁。”吕居仁诗云：“尚惜故人轻作别，乱山
深处过重阳。”又词云：“短篱残菊一枝黄，已是乱山深处过
(字仲举)五言重阳。”皆两用之。诗意脉络贯穿，并优于词。

律《陶器》其实，两家诗词，各有妙境，都是对“重观”所作出的创造性的
中成 开拓。

句，原诗上半云：“又是重残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独立，微雨
燕双飞，——此乃不同 (七) 倒置

诗人云“重观”手法运用，此外抄袭。又吴梅村副
《临江仙》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
(逢旧)有 情曰章，位言曰句。”又云：“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
云：“姑苏城外 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
城外 从后世行文来讲，“事乖其次”、“搜句颠倒”乃至“置言失位”，
晋， 实系辞家之大忌。刘氏之言，确不可易。但如果用历史观点看
人去住， 问题，则古今语言，或多变迁；以今律古，便有齟齬。而且由
江物旧 于修辞要求，倒置以表义，或亦有其特殊作用，“约定俗成”，
以拱。 或亦出于时地风习。关于“倒序例”，曲园先生《古书疑义举
实例此二 解误释之弊，仍有必要。兹略举数例，疏证如下：

句，乃 唐 人 油 蔚 赠 别 营 妓 诗 (见《才调集》卷七) 云：不 对
云：“日照 ① 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
循绳墨而不颇。(《离骚》)

意人 ② 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汤禹严而求合兮，
擎咎繇而能调。(《离骚》)

昔 ③ 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何故？汤禹久远兮，邈而不
泪以拱，此亦“重观”于异人之例。

前 言

抗战时期，我开始爱上了屈赋。这也许是由于中国的民族危机，促使我跟屈原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共鸣。

在贵阳时，就曾以《楚辞》教诸生于上庠，偶有心得，辄笔而存之。虽未敢以著述自期，但却积下不少的资料与零稿。

建国后，五十年代，为了熟悉新事物，学习新理论，工作繁忙，没有整理旧稿的机会。六十年代初，才开始写《〈屈原列传〉理惑》、《〈楚辞〉成书之探索》等篇。发表之后，受到学术界的多方鼓励，殊增惭悚。但十年浩劫，不仅打乱了写作计划，就连旧日的各种书籍与杂稿，也几乎全部散失。而我个人则已年近古稀，并卧病不起者五年之久。

动乱结束，收拾残余。关于建国前的屈赋残稿，只剩下《〈招魂〉“些”字的来源》一篇。建国后的屈赋残稿，除已发表的两篇外，只剩下《草“宪”发微》一篇。余则断章零句，无从清理。仅仅对某些问题的自我理解，犹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而已。

然而，我在万象更新，病体渐有起色的情况下，为祖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的思想，实在按捺不住。乃带病奋笔，把自己对屈赋的旧心得或新看法，有选择地加以整理，成文二十篇，辑为此书。

为了便于读者，本书编纂，以类相从。即：第一组，主要谈屈原的生平事迹；第二组，主要谈《楚辞》的成书与传本；第三组，主要谈屈原的思想与流派；第四组，主要谈屈赋里的神话传说；第五组，主要谈屈赋的语言艺术。总之，都是些探索性的结论，很不成熟。出版的目的，是以此就正于学术界。

在出版的准备工作中，我院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室的领导曾给予大力支持。至于抄写校勘，则皆由研究生李大明同学任其劳。在此并致谢意！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四川师院

目 录

前言

一、《屈原列传》理惑	1
二、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	19
三、“左徒”与“登徒”	39
四、《九章》时地管见	47
五、《楚辞》成书之探索	68
六、释“温蠖”——兼论先秦汉初屈赋传本中两个不同的体系	88
七、关于《九章》后四篇真伪的几个问题	99
八、论《史记》屈、贾合传	111
九、草“宪”发微	141
十、“先功”及其他	167
十一、试论《天问》所反映的周、楚民族的两次斗争	178
十二、民德·计极·天命观	191
十三、从屈赋看古代神话的演化	200
十四、《天问》“顾菟在腹”别解	209
十五、曾侯乙墓的棺画与《招魂》中的“土伯”	217
十六、屈赋语言的旋律美	225
十七、《楚辞韵读》读后感	243
后记	256
编后记（汤序波）	261

一、《屈原列传》理惑

（一）今本《屈原列传》存在的问题

《史记·屈原列传》，本来是研究屈原生平事迹最主要的资料，也是现存的较早和较系统的资料。如果以《楚世家》、《新序》、《国策》等互相参证，则屈原生平事迹，不难秩然得其条贯。

但今本《史记·屈原列传》却存在不少问题，致使屈原事迹前后矛盾，首尾错乱。总括前人所举者，例如：屈子赋《骚》，既叙于怀王疏原之时，又叙于襄王既立之后，则《离骚》之作，究在怀王之世，抑在襄王之时？此其一；又上文既曰“（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屈平既疏，不复在位”，而下文又曰“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则怀王之世，屈原究竟是被“疏”，抑或已被“放流”？此其二；“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大段评论赋《骚》的文字之后，忽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则子兰之怒，究竟是怒屈子赋《骚》，抑是怒屈子之“既嫉”子兰？如果是怒屈子之“既嫉”子兰，则何以中间忽然插入一段评论赋《骚》之语，致文意扞格不通？此其三；又上文“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寻其内容与语气，实与下文“虽放流”以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一大段紧密相承，皆对屈子赋《骚》所作之评语，但中间何以又插入“屈平既绌”到“屈平既嫉之”历叙数十年来秦楚兴兵的一大段，致前后互不相蒙？此其四；全传行文，何以屈原、屈平，交互错出，称谓混乱？此其五；……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则对屈原生平事迹就无法理出一条可靠的线索，从而对屈原平生的政治活动、文学创作、思想发展等，也就无从得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

正因为今本《史记·屈原列传》存在很多问题，故历代研究《屈原列传》的人，曾不断进行探索，企图得一合理的结论。但见仁见智，聚讼纷纭，结论各有不同。其从文学角度而为之说者，对“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两大段文字的插入，或谓此乃史迁的变体，或谓此乃史迁奇玮之妙笔，或谓此乃夹叙夹议的龙门笔法。但“变体”也好，“奇玮”也好，“夹叙夹议”也好，而从行文之规律言之，则首先要求其“通”，如果章节段落之间前无所承，后无所受，首尾横决，文理齟齬，则史迁之文必不至弩劣乃尔。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曾引于慎行《读史漫录》云：“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文章之妙，变化不测。何其迂乎？”近姜亮夫同志虽极力推崇史迁《屈原列传》中这两大段文字是“以苍茫郁勃之气，发为倜傥自恣之文，不能悉以文章规矩相绳”，但又谓“此盖古人文法未甚缜密之处”，“此固不容阿讳”（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总之，从文学角度来看，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次，从历史角度而加以探讨者，则亦有各种不同的结论。例如屈原之作《离骚》，本在怀王时代被疏之时，亦即壮年时期。自汉以来，除《史记·屈原列传》外，如刘向的《新序·节士》、班固的《离骚赞序》、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以下，都是如此，而近古以至现代的屈原研究者，则多根据今本《屈原列传》中“顷襄王立”以下“虽放流”一大段评《骚》文字，并佐以其它论据，谓屈原赋《骚》乃在顷襄王时，亦即晚年时期。如王闾运的《楚辞释》、游国恩同志的《楚辞概论》、《屈原》，郭沫若同志的《屈原研究》，都作如此主张。但亦有感到此说之不安，而游移于以上二说之间者。如姜亮夫同志的《屈原赋校注》、刘永济同志的《笺屈余义》等，皆谓《离骚》之作，当始于怀王之世，成于襄王之时。盖由于今本《史记·屈原列传》既叙屈原赋《骚》于怀王之世，又评屈原赋《骚》于襄王既立之后，故欲以此调和这个不可否认的矛盾。总之，从历史角度探讨《屈原列传》者，始终还没有作出较为稳妥精确的结论。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清末的廖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认为





《屈原列传》全篇文义不贯，前后事实矛盾，竟以此为根据，断定屈原并无其人。而这个结论，后来却被胡适所利用，在他的《读楚辞》里，借口屈传的矛盾，否定屈原的存在，说什么屈原是后人凭空捏造出来的“箭垛式”的人物，从而在中国历史上把屈原这位伟大诗人一笔抹掉。

不难看出，由于今本《史记·屈原列传》存在很多矛盾，给屈原研究者带来不少困难和问题，致使屈原生平事迹之真相，无由大白于后世，是不可以不辨。

（二）今本《屈原列传》之被窜乱及原本《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

考今本《史记·屈原列传》中由“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在班固的《离骚序》中引用时，说它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之语。盖刘安的《离骚传》班氏犹及见之，故加引用，其言信而有征，历代对此并无异义。但是，这里却有两个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即对《屈原列传》里的刘安这一段话，人们始终认为是史迁自己采入《屈原列传》的，而并没有意识到它是被后人窜入的。其次，今本《屈原列传》中属于刘安《离骚传》的话，是止于上述的那一段，抑或还有其它部分，人们至今还没有明确地识辨出来。因而对屈原事迹的考证，纠葛百出，缠绕不清。如果能将以上两个问题理清，还原史迁《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则屈原的生平事迹和创作活动，自然会条贯分明，了如指掌，前人之所纷然聚讼者，亦不难迎刃而解。

今按，史迁当时并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今本《屈原列传》中所引刘语，乃后人所窜入者。因为史迁的《史记》和刘安的《离骚传》都写成于汉武帝之时；刘安《离骚传》之写成，虽略早于《史记》，而史迁实未得见。所以，史迁在《史记·淮南王列传》中，只云：“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叛逆，未有因也。”而

关于淮南王所著书与辞赋，则一字未及。至班固撰《汉书》时，《淮南王传》全袭《史记》，唯于“流名誉”句下，始增补下列一段：“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及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而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着重号都是笔者加的。下同）高诱《淮南子叙目》亦云：“初，安为辩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高诱的这段话，跟《汉书》大致相同，但有两个错误：第一，“孝文皇帝甚重之”，“文”字显系“武”字之误。“皇帝为从父”句，因既误“武”为“文”，故世系关系不得不改。实则孝文帝时，刘安年尚幼小，所谓招致宾客著书立说等一切活动，都跟他的年龄不相适应，故应以《汉书》为是。第二，《离骚赋》也显系《离骚传》之误。荀悦《汉纪》的《孝武皇帝纪》，虽“武”字未误，而“传”亦误“赋”。此盖因《汉书》中“使为《离骚传》”之下，又叙刘安献“赋颂”，故与《离骚传》相涉而误。《汉纪》全以《汉书》为据，而顾炎武《日知录》曾谓：《汉纪》“间或首尾不备，其小有不同，皆以班书为长”。误《离骚传》为《离骚赋》，当即其中之一例。荀、高都是东汉末年人，而荀悦的错误，影响较大。说详下段）考史迁书例，凡前人著述，或叙其书目篇卷，或录其作品原文，或具体，或概括，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出来。而著述宏富如刘安者，竟在《史记·淮南王列传》中一字未提，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刘安的《离骚传》等，史迁并未见过。

有的同志认为《史记·淮南王列传》：刘安谋反时，胶西王刘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这其中的“书、节、印、图”的“书”，即指淮南王所著诸书。但我认为这样理解“书”字，是不确的。因为这里的“书”跟“节”、“印”、“图”四者并举，事实上皆指刘安谋反时的“物证”而言。而且紧接上文，皆



有所承。所谓“书”，是指刘安听伍被计所伪造的文书等，亦即上文所说：“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侠。……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逮书，以逮诸侯太子幸臣。”所谓“节”、“印”，是指刘安谋反时所伪造的“节”与“印”等，亦即上文所说：“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所谓“图”，是指刘安谋反时所绘用的军事地图等，亦即上文所说：“王日夜与伍被、左吴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因此，下文胶西王举出“书、节、印、图”，为“大逆无道，当伏其法”的罪证。如果其中的“书”是指的《淮南鸿烈》、《离骚传》等，则武帝当时如此喜爱的书，怎能据此以构成“伏法”的罪状？故从《史记·淮南王列传》中，实难找到史迁曾见过《离骚传》等书的痕迹。

至于史迁当时之所以未见淮南王所著书及《离骚传》等，盖当时这些书，虽已献之武帝，而未宣布于世。故史迁并未得见，当然更无从著录于本传，更无从采入《屈原列传》。淮南王书当时之所以未布于世，推其原因，盖不外其始武帝“爱秘”之，故未予宣布。所谓“爱秘”，当谓置之手边，秘不示人，或置于刘向《七略》所谓“秘室之府”；并不是付之“太常、太史、博士之藏”，供史官披阅。继因淮南王以谋反被诛，故又不便宣布。汉代因谋反而不传其书者，史有事例。如《汉书·儒林传》云：“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大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可见，由于刘安谋反被诛，其书未得宣布流传，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史迁即使见过刘书，亦不便广为征引传播，况因上述种种原因，史迁并未得见。迨元成之世，刘向校书中秘，始得淮南王书而叙录之（见高诱《淮南子》序）。而《离骚传》亦当同时出现。故班固撰《汉书》，始得据所见以补《史记·淮南王列传》之缺。因此，史迁既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则今本《史记·屈原列传》中所引用的《离骚传》，并非原本《史记》所固有，乃后人窜乱之文；而且由于窜乱者学识卑劣，以致前后矛盾，文理不通，历代学人，感受

其累。

其次，刘安《离骚传》语之被窜入《屈原列传》者，其实并不止于班固所引用的那一段。就今本《屈原列传》而言，由“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由“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两段文字，都是后人割取《离骚传》语窜入本传者。要确定这个问题，首先不能不对未被割裂的《离骚传》的原型作一番探讨。

根据班固的《汉书·淮南王传》和《离骚序》，都说刘安作《离骚传》；只有荀悦、高诱等，才说是作《离骚赋》。其实班固的说法，具有最高权威。因为他不仅在《淮南王传》里述及刘安作《离骚传》的事实，而且他确实也读过《离骚传》的原文，并在他的《离骚序》里加以引用和评价（刘勰的《文心雕龙》里，有时称之为“传”，有时称之为“赋”，盖因刘安书已佚，故只得根据不同的记载而为之说）。刘勰在《辨骚》里引用《离骚传》的一段话，全系从班固的《离骚序》里转抄而来，并没有见过原文。因此其中对字句的省略和剪裁，与《离骚序》完全一致。而王念孙竟认为《汉书·淮南王传》中《离骚传》的“传”字当系“傅”字之误，“傅”乃“赋”之同音借字，刘安所作乃《离骚赋》，非《离骚传》（见《读书杂志》）。王氏此说实大误。因为据班固《离骚序》中所云，刘安所作的《离骚传》，既有总叙，又有注文，并不是“赋”。他说：刘安以为“五子以失家巷，谓五子胥也。及至少康、武姚、有娥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这就是指的《离骚传》中的注文而言。所以王逸在《离骚经章句序》中又称它为“淮南王安所作《离骚经章句》”。颜师古《汉书》注说《离骚传》犹如《毛诗传》之类，这说法是对的。但《离骚传》又有一个总叙，班固序引用“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段，说是“淮南王安叙《离骚传》”的话，也就是指这个总叙而言。今本《屈原列传》中所窜入的，也就是《离骚传》的总叙部分。由此可见，刘安的《离骚传》跟后来班固、王逸之注《离骚》其体制是相同的，即注文之外，又有总叙。

现在，我们如果把被后人窜入《屈原列传》中的两大段文字联系

起来（当然中间难免有所删节），更可以发现刘安、班固、王逸三家的总叙，虽论点不尽相同，而其结构层次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也许是班、王袭用了刘氏旧例的原因。例如：

（1）解释《离骚》的命名：

离骚者，犹离忧也。……（刘）

离，犹遭也。骚，忧也。……（班）

离，别也。骚，愁也。……（王）

（2）阐述《离骚》的内容：

上称帝嚳，下道齐桓，中述汤武，……（刘）

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班）

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王）

（3）说明赋《骚》的意图及怀王不听忠谏的结果：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刘）

以讽怀王，终不觉悟，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班）

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拘留不遣，卒客死于秦。（王）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未被割裂的刘安的《离骚传》，其结构层次，与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大同小异。因此，今本《屈原列传》中被后人窜入的《离骚传》的话，不仅班固所引用的“国风好色而不淫，……争光可也”这一段，而是从“离骚者，犹离忧也”直到“争光可也”这一大段。这是刘安《离骚传》的前半部。其次，从以上的比较中更可以看出，今本《屈原列传》中由“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一大段，也是后人窜入的《离骚传》语。这是刘安《离骚传》的后半部。前半后半不仅文笔风格完全一致，而且结构层次也脉络相通。两段合起来，犹可以看到接近完整的《离骚传》的梗概。

既然把后人窜入部分由《屈原列传》中剔除出去，则原本《屈原

列传》的真面目即呈现出来。即史迁原本《屈原列传》，大体与刘向《新序·节士》篇相近。虽详略互见，而梗概略同。其“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下，跟《节士》篇一样，紧接着就是秦使张仪至楚献地，追楚绝齐。盖屈原既绌，张仪之计始得行，叙笔极为严密。这中间并没有今本“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文字。在怀王客死于秦，长子顷襄王立，“屈平既嫉之”之下，也跟《节士》篇一样，紧接着就是襄王听信谗言，放逐屈原。这中间也没有今本“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一大段文字。《节士》篇的资料，其价值仅次于《屈原列传》，虽不能说他与史迁所根据者同出一源，但同为先秦古传之仅存者，则可断言。故其基本梗概是互相吻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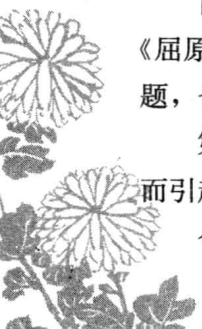
后人何以要窜入这两段文字？从前一段看，盖企图接在屈原赋《骚》之后，对《离骚》的内容作一番阐述与评价。这一段的窜入，除了史实与评语互相杂厕，文意扞格以外，倒没有别的大问题。至于第二段的窜入，盖企图说明怀王国败身亡为天下笑，是由于不纳屈原忠谏的结果。但这一段却窜错了地方。如果是窜在怀王“竟死于秦而归葬”之下，虽文理扞格，尚不大乖于史实。而不谓竟窜于“长子顷襄王立”和“屈平既嫉之”之下，遂致文理扞格，史实淆乱，造成千古疑案。除本文第一节所举者外，又如日本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于屈传“终不悟也”一段下引日本学者中井积德曰：“怀王既入秦而不归，则虽悟无益也。乃言‘冀一悟’何也？”可见此段疑案，不仅古今同感，亦中外一致。

（三）屈原研究中疑难问题的解决

由于揭示了今本《屈原列传》被后人窜乱的事实，恢复了原本《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于是在屈原研究中一向聚讼纷纭的疑难问题，也就不难予以合理的解决。

第一，关于屈原赋《骚》的年代问题。这是由今本《屈原列传》而引起的争论焦点之一。

今按屈原赋《骚》，不是在襄王放原之后，而是在怀王疏原之时。



两汉以来古说，本无歧异。刘向的《新序》、班固的《离骚赞序》、王逸的《离骚经章句序》等书，都是一致的。由近古到现代，才有人提出《离骚》作于襄王之世的说法。这个说法的产生，当然不只一个原因，但今本《屈原列传》被后人窜入的“虽放流，……岂足福哉”一大段文字，却是引起问题的重要原因。但不知原本《屈原列传》在顷襄王即位之后并没有这一段文字，与两汉诸家古说并无二致。在恢复了原本《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后，这一说法就失掉了它的根据。至于刘安的《离骚传》，是否有此说法呢？经过上述的探索，知道刘安也是把屈原赋《骚》放在怀王信谗之后。下文虽然涉及怀王之死，但不过是为了说明怀王之死是由于不采纳屈原在《离骚》中蹇蹇忠谏的结果，并不是说明赋《骚》在怀王死后，当然更没有涉及到襄王放原之事。可见刘安也没有《离骚》作于襄王时的说法。未被窜乱的《屈原列传》和未被割裂的《离骚传》，皆条理明晰，毫无矛盾。浅人窜乱，乃成疑案。所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当然，主张《离骚》写于襄王之世的，还有其他的证据。如游国恩同志在《楚辞概论》中曾举出《离骚》的下列词句，说明它是屈原晚年的作品，不是壮年的作品：

(1)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2)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3)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但游氏所举的这三例，不仅不能证明《离骚》是晚年的作品，相反地更足以证明它是壮年的作品。因为从这三句的语气看，凡两言“将”，则所谓“零落”、“迟暮”、“老”，显指将来而言，非指现在而言；凡三言“恐”，则分明是怕老之将至，而非言老之已至。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举出与此相反的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1)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2)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3)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就时间的称谓来看，其曰“未落”，曰“未晏”，曰“未央”，曰“方壮”，则显指壮年而言；就心情的表现来看，则三句凡三言“及”，则